

博士文库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 7

8世纪中国史学内里论成就

罗炳良 / 著

92.4
933

出版社

7



罗炳良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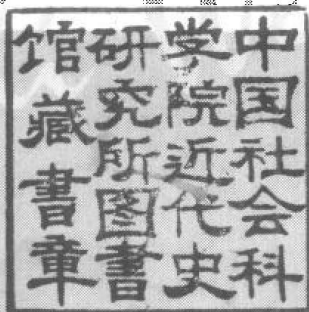
Bohai Wenku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

18 世纪 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

罗炳良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北京

罗炳良 / 著

18 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F A N D A X U E B O S H I W E N K U

Boshi Wenk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 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罗炳良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1
(博士文库)
ISBN 7-303-05559-2

I. 1… II. 罗… III. 史学-研究-中国-18 世纪
IV. K0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400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9.75 字数:28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16.00 元

总序

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一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于1983年开始博士学位授予工作。17年来,先后有839人在我校取得博士学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各级党政机关的业务骨干,其中一部分已成为本学科领域非常知名的学者,一部分同志则担任着非常重要的领导职务。他们都为我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了系统展示北京师范大学过去17年间(特别是近几年来)博士研究生培养所取得的成绩,全面总结我校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同时也为促进我国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决定,从公元2000年起,陆续出版《博士文库》。

2000年出版的《博士文库》除收录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外,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增加了

几部此前已经出版的学位论文,以求较为完整地反映北师大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发展历程。此后,《博士文库》将主要出版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人员的、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而进行研究的成果。

《博士文库》的评审程序是,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推荐,经《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审议,确定其中优秀的科研成果推荐出版。

我们计划,每年推荐优秀成果陆续出版,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不仅能够从一个重要的视角反映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变迁,同时也有利于新一代学者的培养,有利于学术的积累和发展。我们相信,十年、二十年以后,这项工程的意义将会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到那时,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会为我们曾经做过的工作而感到自豪、骄傲。

在出版业日趋市场化的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从中国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长远需要出发,斥巨资支持出版《博士文库》,表现了出版家的气魄与胆识。在此,我们代表已经或将可能从这项工程中受益的每一位学者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崇高的敬意、谢意。

《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0年11月

内 容 提 要

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史学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由于18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成果极其辉煌，以致掩盖了这一时期理论上的成就，这个问题久为人们所忽视，没有得到应有的阐发。作者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方面揭示出18世纪中国史家在理论上的贡献，既有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因和法则、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历史评价原则等方面的理论，又有关于史学属性和史家素养、史学和社会的关系、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等方面的理论，这些内容成为全书的主要特色。同时，本书对以前某些牢不可破的观念，例如把乾嘉史学与乾嘉历史考证学混为一谈、历史考证学派重考证而轻褒贬是不要历史评价、乾嘉史学中缺乏经世致用思想等看法，都提出了新的认识。书中还提出一些尚待研究的问题，可以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研究作参考。

序

罗炳良博士的学位论文《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被本校研究生院和出版社遴选收入北京师范大学首批“博士文库”，不久就要出版了。我为炳良在学业上的不断进步和学术上的进取精神及所获得的初步成果，由衷地感到高兴。本书付梓之际，炳良要我写篇序。作为指导教师，这恐怕也是一种推辞不了的义务。乘着这个机会，我想就本书所讨论的问题，讲一点认识。

18世纪的中国史学以其著名史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历史考证，久负盛名，其影响所及直至于今。当时的考据也有弊病，那是考据末流所为，早已被同时代的章学诚斥为“读书之功少而著作之事多，耻其言之不自己出也，而不知其说之不可恃也。”（《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族孙守一论史表》）故就整体与主流来看，18世纪中国史学的历史考证之学，实是中国史学优秀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不论是崇尚考据的人，还是小视考据的人，大多不免有一个认识上的偏颇，即乾嘉史学就是考据之学。这样的认识，在本世纪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当然，乾嘉史学长于考证，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乾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不应该被埋没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不仅关系到对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派的全面评价，而且也关系到对乾嘉时期中国史学整体面貌的认识与评价。于是，我产生了一

个朦胧的认识：乾嘉史学的理论成就被人们遗忘得太久了。

1995 年盛夏，我应邀参加了“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并以“18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为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受到清史学界的朋友们的肯定和鼓励。我说的“两大趋势”，一是历史考证的趋势，一是理论探讨的趋势。从理论探讨来说，又有两条脉络可以清理：一条脉络是章学诚、邵晋涵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书提要，其余绪则延至 18 世纪末阮元主持的《四库未收书提要》之有关史书提要。这条脉络在理论探讨的形式上虽各迥异，但都具有总结性与批评性相结合的性质，其探讨的重点以史学理论为主而兼及历史理论。另一条脉络是历史考证学家的代表人物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崔述等在他们的考史著作中所包含的理论探讨，其特点是于考证中阐发理论认识，或在理论认识基础上胪列考证所得，其探讨的重点是历史理论而兼及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论。这两条脉络汇合成 18 世纪中国史学在理论探讨方面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的客观存在和历史意义，对于全面估量 18 世纪中国史学的价值和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遗产，都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深入探讨和阐述 18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无疑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而对于炳良来说，其艰难的程度更多了一层含义。炳良以攻中国古代史专业在兰州大学获硕士学位后，执教于工科大学，八年当中，讲授了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程，而以钻研宋史为业余爱好，且时有所得，予以发表，可以说是逐步上路了。其间艰难，可想而知。1995 年他转而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并根据我的建议，以 18 世纪中国史学为研究方向，这意味着他从研究历史要转向研究史学，从研究宋代要转向研究清代，此可谓多重艰难的重叠。

炳良经过认真考虑,毅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从而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探索道路。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发表了十余篇关于18世纪中国史学之理论成就的论文,同时申报并获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青年基金项目《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常言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刻苦钻研,取得了初步的收获。对此,我一方面感到欣慰,一方面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炳良在多年艰难的转换中,毕竟找到了自己的学术位置。今后的路还很长,18世纪中国史学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总结嬗变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希望炳良以此为起点,在这个领域里继续辛勤耕耘,不断取得新的收获。

在中国历史学界,很长时间以来,对有关客观历史的理论问题(历史理论)和有关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史学理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缺少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有时甚至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这种情况,既妨碍对于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更不利于对于史学理论研究的展开,从而在整体上影响到中国史学之理论的发展。80年代后期以来,这个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有鉴于此,炳良的这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讨论历史理论,下篇阐述史学理论,虽难免尚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总的来看,可以得其大体,且多有创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因其考察的对象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它们又是有联系的,不可截然分开,并且在一定的前提之下还可以互相包容。关于这一点,我在80年代曾有专文讨论过,这里不来重复了。我之所以重提这些旧话,是表明我的一种期待,即期待有更多的史学界朋友来关注理论建设,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都能有更大的进展,有更多的著作问世,以有助于中国史学的新的发展。

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产，需要我们去爬梳、总结、阐述，这对全面地和深入地认识中国史学是非常必要的，对促进当代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对发展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这方面，我们虽有了一定的认识，而我们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罗炳良博士的这本书，对 18 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所作的研究也只是初步的。书中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可以作更加深入的考察；书中没有涉及到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使认识不断丰富起来。作者本人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正是本书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的学术意义。

是为序。

瞿林东

1999 年 7 月 8 日序于

北京师大史学研究所

目 录

绪论	(1)
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	(1)
二、18 世纪中国社会与史学思潮的演变	(4)
三、18 世纪中国史学的两大发展趋势	(11)
四、近百年来关于 18 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概况	(15)
五、研究 18 世纪中国史学理论成就的重要性	(21)

上篇 历史理论：18 世纪中国史家 对客观历史的认识

第一章 关于历史进程的动因	(31)
一、对“时势”的新认识	(31)
二、“气运”与历史进程	(41)
三、“民心所愿”与历史发展	(51)
第二章 关于历史演变的法则	(57)
一、对“道”认识的不断深化	(57)
二、“风会”递变与治乱盛衰	(68)
三、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	(81)
第三章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89)
一、“好古”与“知时”	(89)
二、“礼，时为大”的见解	(99)
三、鉴古识今的历史意识	(106)

第四章 关于历史评价的原则	(115)
一、历史主义地评价历史	(115)
二、“义理参之以时势”	(127)
三、“知世”而“论人”	(142)

下篇 史学理论：18 世纪中国史家 对史学自身的认识

第五章 关于史学属性的辨析	(155)
一、乾嘉史家的共识：“六经皆史”	(155)
二、“撰述”与“记注”的性质和特征	(166)
三、“史法”与“史意”的区别和联系	(174)
第六章 关于史家素养的反思	(189)
一、“直书”“曲笔”观念的深化	(189)
二、“心术—史德”理论的意义	(201)
三、史学家法与别识心裁	(213)
第七章 关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	(220)
一、求真与致用的对立统一	(220)
二、对“博古”与“经世”的辩证认识	(237)
三、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	(247)
第八章 关于史书体裁演变的朴素辩证思想	(252)
一、对史书体裁起源的探究	(252)
二、对史书体裁发展的阐释	(259)
三、对史书体裁创新的设想	(274)
结语	(285)
参考文献	(290)
后记	(297)

绪 论

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18 世纪的 100 年，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传统社会转入近代社会的界碑。其标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类社会的历史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世界范围内来看，18 世纪人类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就是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走向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经济，近代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个世纪中，英国出现了产业革命，法国发生了资产阶级大革命，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经济各部门中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新兴的市民阶层力量不断壮大。第二，在这个世纪中基本上奠定了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格局。中国清代中期的疆域达到历史上范围最广阔的程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趋于定型。欧洲结束了长期封建割据局面，发展成英、法、德、意等几个主要强国。沙皇俄国通过蚕食弱小国家，扩张领土，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美国独立以后，由于大规模西进运动，疆域迅速扩大，成为美洲大陆上的强国。这说明，18 世纪人类的近代领土意识和国家观念已经形成，并且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产生了以文化复兴为特征的启蒙思想，理性主义思潮占据了思想文化领域。当时的世界各国为创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文化，积极地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东、西方国家在 18 世纪都出现了复兴传统文化的趋势。中国的学术是以回归“汉学”的形式对 2000 多年的传统经史之学作了一次全面清理，形成了具有近代理性因素的乾嘉考据学。西欧国家复

兴希腊、罗马文化，以近代启蒙思想反对中世纪宗教迷信思想，产生出包罗各种学科的百科全书派，形成了近代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这表明在社会变革时期，人类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加以总结，推陈出新，为近代社会服务。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了这 100 年必然受到后人重视，成为世界历史学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

为了加强世界各国对 18 世纪社会历史的研究，沟通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1963 年正式成立了“国际 18 世纪研究会”。该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先后举办了十余次国际学术会议，促进了各国 18 世纪研究组织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国际上研究 18 世纪社会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早在 50 年代，亚·沃尔夫就著有《18 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①，本书叙述了 18 世纪欧洲在自然科学、心理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此后，纳昆·苏珊和饶斯基·伊夫林合著《18 世纪中国社会史》^②，对整个清代特别是 18 世纪中国社会变化轨迹、内部结构、发展动向等问题作了叙述和研究，认为 18 世纪中国社会不仅是清代发展的高峰，而且是整个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峰。沃尔金著《18 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③，介绍和阐述了 18 世纪法国朴素唯物主义者和空想主义者的社会学说。芒图著《18 世纪产业革命》^④，是研究 18 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经济史著作。利温奇著《18 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⑤，叙述了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学、艺术、思想、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的影响。窥一斑而见全豹，足以说明国外学术界对 18 世纪历史研究的广泛与深入，成就较大。

相比之下，我国对 18 世纪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专门论述这个世纪的著作非常少，仅有李凤鸣、姚介厚合著《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⑥和

① 该书中译本由周昌忠等翻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出版。

② 该书由耶鲁大学 1978 年出版。

③ 该书中译本由杨穆等翻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出版。

④ 该书中译本由杨人楩等翻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出版。

⑤ 该书中译本由朱杰勤翻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出版。

⑥ 该书由北京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李亚宁著《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17、18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①等为数不多的研究著作。1995年，为推动我国学术界对18世纪的研究，成立了“中国18世纪研究会”，致力于中外18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的研究。目前，由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戴逸先生主持的国家“八五”社会科学重点项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课题已经完成，这项研究成果的九卷本专著已经正式出版^②，标志着我国研究18世纪历史的总体学术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

由此可见，18世纪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学术研究中颇受重视的领域。鉴于国外的18世纪研究已经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加强18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史学界历来习惯于以朝代为断限研究历史，这主要是考虑到历史时期的完整性。这对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研究自然很便利，然而学术思想的发展却不一定以朝代为起讫。某些学术思潮并非一个封建皇朝所能全部包容，例如玄学思想即贯穿于曹魏、两晋、南朝等六个皇朝；而某些较大的封建皇朝中却不只一种学术思潮，以清代为例，在260余年的历史中，学术风气及其文化特征发生了数次变化，必须细分阶段研究，才能真正弄清各种文化特征的真谛。18世纪以前，中国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封建理学思想占据主流；18世纪以后，是近代的历史进化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18世纪的100年，则是由程朱理学向乾嘉朴学的转变以及朴学占据学术主流的时期，形成一种新型文化特征。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研究的领域，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与以朝代为断限的研究方法不仅不矛盾，而且能够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有利于揭示学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以18世纪的100年为研究范围，目的在于站在中外史学研究的前沿，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过去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对18世纪的中国历史达到全面的理解。

① 该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② 该书由辽海出版社1999年出版。

二、18 世纪中国社会与史学思潮的演变

18 世纪的中国，正是清皇朝统治时代，从康熙朝后期，经雍正、乾隆到嘉庆初年的 100 年时间。此时正值清代社会鼎盛时期，国家政治局面稳定，封建经济空前繁荣，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强国，也是世界主要强国之一。政治、经济的发展为学术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而清皇朝推行的文化政策，又对一代学术风气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清代学者首先致力于儒家经典的考证与注疏，而后旁及史学、历学、算学、地理学、金石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等领域。这种治学方法在乾隆、嘉庆年间风靡全国，史称乾嘉朴学，又称乾嘉汉学、乾嘉考据学。

首先，乾嘉朴学的形成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是学术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18 世纪前期的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清代的官方学术仍然承袭宋明以来的程朱理学思想。清廷建立起稳固的全国统治以后，企图利用程朱理学统治全国人民，从思想上钳制民心。康熙时重新刊布《朱子全书》、《性理大全》，编订《性理精义》，以朱熹（1130～1200）配享孔庙，重用理学名臣李光地（1642～1718）等人辅弼政治，以四书五经开科取士，全面推行程朱理学思想。但是，由于元明以来理学家尊德性而轻事功，导致学术思想内容贫乏，已经失去了维系人们信仰的功能，所以清廷尊崇程朱理学的作法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宋明理学思想空疏的弊病日益暴露在世人面前，受到后人越来越多的批判，到 18 世纪达到高潮。钱大昕（1728～1804）批评这种不良学风说：“尝病后之儒者，废训诂而谈名理，目记诵为俗生，呵多闻为丧志，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①这就尖锐地指出了明代学术积弊之所在。他还针对这种学风寻根溯源，认为“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

^① 《潜研堂文集》卷三三《与晦之论尔雅书》。